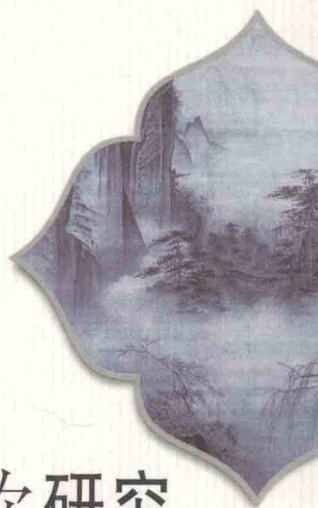




隋代诗歌研究

Study on Poems of

SUI DYNASTY

杨金梅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隋代诗歌研究

Study on Poems of
SUI DYNASTY 杨金梅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代诗歌研究/杨金梅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097-2446-0

I. ①隋… II. ①杨…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隋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1502 号

隋代诗歌研究

著 者 / 杨金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魏小薇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丁立华

项目统筹 / 魏小薇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3.8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206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446-0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隋诗发生的文化背景	28
第一节 隋代的文化建设	28
第二节 隋代的图书事业	46
第二章 隋代的文学思想	54
第一节 隋代前期的文学思想	54
第二节 隋代后期的文学思想	68
第三章 隋代诗人地位之升沉及其文学影响	77
第一节 隋代诗人地位之升沉	78
第二节 诗人地位升沉之文学影响	103
第四章 隋诗的题材类别	112
第一节 边塞题材	112
第二节 赠别题材、山水题材及其他	121
第五章 隋代诗人群体与创作趋势（上）	
江左诗人：因循旧迹	133
第一节 江左诗人的创作倾向	134
第二节 江左诗人群体	136
第六章 隋代诗人群体与创作趋势（中）	
关陇诗人：渐次觉醒	152
第一节 关陇诗人的创作倾向	152
第二节 关陇诗人群体	153

2 隋代诗歌研究

第七章 隋代诗人群体与创作趋势（下）

山东诗人：渐入佳境 159

第一节 山东诗人的创作倾向 159

第二节 山东诗人群体 162

第八章 诗人专论之杨广 174

第一节 杨广诗歌的题材与审美特质 174

第二节 杨广对南北诗风的融合 180

第三节 杨广对隋代诗坛的影响 191

第九章 诗人专论之杨素：人格与诗格的悖反 194

第一节 杨素诗歌题材及其风格 194

第二节 杨素诗歌的艺术成就 203

第三节 诗格与人格的悖反 209

第十章 诗人专论之卢思道、薛道衡 215

第一节 卢思道的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215

第二节 论薛道衡诗歌 225

附录一：杨素与薛道衡交往因缘考 231

附录二：薛道衡死因新辩 233

第十一章 隋代的女性诗 239

附 录 248

一 隋代诗歌补遗 248

二 隋诗研究汇编 254

三 唐宋诗词中的隋诗 261

主要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69

绪 论

一 隋诗研究的进程与意义

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史上，无论是诗论发达的明清时代，还是文学整体研究日益深入的现当代，隋诗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明清论者（如王士禛、陈祚明、沈德潜诸人）论及隋诗往往是简单的诗人、诗作的点评，范围也仅限于杨素、杨广、薛道衡等少数诗人。近代以来局面稍有改善，研究领域较之以前有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拓展，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近代的隋诗研究基本上可以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90 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史性质的论著中。在 1925 年徐嘉瑞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对隋诗有过较高的评价，徐氏认为：“虽然当时没有产生十分有价值的文学，但是杨素、虞世基、薛道衡等的诗，已经开了初唐四杰的先河。”^① 唐初的诗坛包含着两股力量，一是以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的宫廷诗人，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继承梁陈宫体文学风格；另外一股力量则是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他们分别从实践和理论的层面对初唐的宫廷诗风加以革新，为下一阶段唐诗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徐氏指出杨素诸

^① 徐嘉瑞：《中国文学史》，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第 167 页。

人开“初唐四杰”之先河，实际上是间接肯定了隋诗之于唐诗的积极影响。稍后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则从形式方面肯定了隋诗的文学史价值，“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①，这一点在薛道衡和杨广等人的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上述诸作均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彼时也是隋代文学研究相对繁荣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到80年代之间，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方面，结论性的成果不及前一阶段，隋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这一期间主要的观点来自于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该书在肯定隋诗在诗风、格律方面取得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隋诗仍然未能摆脱齐梁不良文风的影响，“在整个隋代，齐梁影响都是比较根深蒂固的”^②。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初版于1963年，之后一直作为高校中文专业“古代文学史”教材，影响颇为深远。出版于80年代末的《八代诗史》（葛晓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将隋代诗歌单独列为一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隋代诗歌的面貌及其形成的原因，对主要作家、作品做了相对集中的概括性论述，是这一阶段论述隋诗最为全面的著作。除此之外，有关隋诗的资料整理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重要成就。近人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录了10卷《隋诗》，共计400余首，成为现在研究隋代诗歌的基本依据；曹道衡、刘跃进所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对隋代的文学材料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成为进一步研究隋诗不可或缺的助手。总体来看，90年代以前隋诗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得出了一些基本性的

①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9，第61页。

②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21页。

结论,^① 研究者虽然未有深入细致的解析,但他们的主要观点与思路对后来研究者的启示作用十分明显。90年代后,隋诗研究有所拓展,在各类文学教材中都有对隋诗的分析评价,较之以前显得深入和详细,逐步细化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研究趋势。有关隋诗的专门论文陆续出现,主要有:《论隋代诗歌》(曹道衡撰)^②、《历史的追溯——对隋代诗歌的文化阐释》(康震撰)^③、《文化整合视野中的诗史进程——论隋代诗歌的文化史意义》(康震撰)^④、《隋诗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张采民撰)^⑤以及《隋代美学概说》(吴功正撰)^⑥等。有关重要作家(如杨广、卢思道、薛道衡)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有:《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杜晓勤撰)^⑦、《隋代文场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吴功正撰)^⑧、《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张玉璞撰)^⑨。此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隋唐之际诗歌之演进》(张采民著),对隋代诗歌在文学史进程中的意义作出了相对全面的论述与评价,尽管不是隋代诗歌的专著,但它出现于隋代诗歌研究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其价值与意义尤其值得重视。进入新世纪,隋诗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相继出现了几篇以隋代文学或隋诗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提高。

① 前面提到的几部文学史同时指出了隋诗的过渡性特征,这大概是这一阶段隋代文学研究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

② 《齐鲁学刊》1997年第2期。

③ 《唐都学刊》1997年第2期。

④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⑤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⑥ 《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⑦ 《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⑧ 《齐鲁学刊》2001年第4期。

⑨ 《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4 隋代诗歌研究

近代以来，隋诗研究取得的成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与其前后的南朝、唐代诗歌研究相比，隋诗研究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成果上仍然相距甚远。隋诗研究遭遇冷落有其客观原因，即隋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媲美其前后阶段的诗歌：隋诗既无南朝诗歌的创新之功，更不及唐诗的彬彬之盛，是处于两座山峰之间的低谷。这样的处境自然不容易吸引更多的关注。但是，文学研究的价值并不能单纯地立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成就，还应包括文学现象形成背后的各种动因及其影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文学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是一个直线式的过程，高峰和低谷的出现都有其必然之因，两者同是一个完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忽视对“低谷”部分的研究可能会造成对“高峰”部分研究的不完整、不全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隋诗本身的成就固然有限，但它同样是文学史上的客观存在。在古典文学研究越来越向细致化、深入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厘清这一阶段诗歌的面貌、生成的动因及其对下一阶段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史尤其是唐代诗歌史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 隋诗发展的环境

文学发展所依据的环境可以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部环境包括文化政策、文化氛围、社会思潮以及士人的审美取向等因素，内部环境则是指文学发展所依据的内在规定性，具体而言就是对“内容”和“形式”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从外部环境看，隋诗的发展条件并不理想，隋代社会既没有南朝的重文之风，更没有唐代健康而平衡的文化环境。《隋书·经籍志（四）》在论及隋代文学发展的背景时曾提到：“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

草泽怨刺，于是兴焉。”^① 持论虽不完全正确，^② 但它提到的属文之士遭遇不平的现象还是比较客观的。汉代以后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文艺活动基本上是贵族阶层的专利，文学发展与贵族阶层的审美好尚关系密切，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封建君主的态度及其执行的文艺政策。隋代统一后这种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③ 隋代诗歌的发展与隋代台阁文人^④以及两代君主的好尚及其执行的文艺政策均有密切关联。隋文帝时代推行勤俭持国的方略，在审美取向上倡导“斫雕为朴”，这样的社会环境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南朝华美文风对隋代文坛的渗透和影响，但同时也限制了文学对于审美趣味的追求。就文学观念而言，隋文帝继承的是北朝传统的文艺观，对文艺的认识完全基于实用的立场，以文艺为教化之具。文帝对纯文艺的态度尤为冷淡，不仅多次下令禁止俗乐、解散乐工，甚至效仿西魏时代的宇文泰，以行政手段干涉文学发展，将文学的功用完全限制在教化民众的范围之内。在最高阶层这种消极态度影响下，隋代前期的文学氛围殊为淡薄，南朝时代整个社会对文学的狂热（“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终朝点缀，分夜呻吟”^⑤）状况已经荡然无存。终隋一代的文学气氛不但比

①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唐）魏征、令狐德棻撰，北京：中华书局，1973。（本书中多次出现的引用书籍，除第一次注明出版单位及版本外，再次出现时均不再重复注明出版单位及版本，下同。）

② 包括《隋书》、《资治通鉴》在内的众多典籍都曾提到隋炀帝善妒，甚至不惜杀戮善文之士，并由此得出炀帝对于隋代文学发展产生阻碍的结论（如葛晓音著《八代诗史》，第318页）。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炀帝妒才的观点未必正确（详见本书第十章附录）。其次，就算炀帝妒才是真，这种个人行为（不同于明清时代的文字狱）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文学产生影响也值得思考。

③ 直到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推广，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量涌现，这种状况才逐步被打破。

④ 隋代作家大多围绕在文帝、炀帝周围，或为朝中大臣，或为帝王亲信。

⑤ （梁）钟嵘：《诗品·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不上南朝，就是与北齐时代相比似乎也逊色许多，^①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人阶层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

隋代诗人主要出自原本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山东和江南地区的士人集团，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文学素质，入关后新王朝并不理想的文化环境对于文人的创作热情显然是一个严重制约。不仅如此，在隋文帝“打击山东豪族”和“排斥江南旧族”政策的影响下，来自山东和江左的诗人大多仕途不顺，“郁郁于薄宦”或者职位上“非其所好”的情况屡见于书，卢思道、薛道衡、王胄、孙万寿诸人均是显例。政治上的厚此薄彼不仅容易导致山东、江南籍诗人的抑郁和消极，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三地士人彼此心理上的认同，进而影响到文化的交流。从历史上看，大凡文学氛围浓厚的时代，文人之间的交往总是非常密切的。建安时代有以曹丕、曹植兄弟为核心的“西园之游”，西晋则有以石崇为中心的“金谷俊游”，即使是文学水平相对较低的北齐时代，文人之间也不乏频繁的文学交往。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有两段记载：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

① 这一点可以从隋代文人普遍缺乏交流活动这个侧面得到印证，与魏晋、南朝以及唐、宋、五代文人交往频繁的情况相比，隋代的文人交往很少，几乎没有一次重大的文学活动。

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琊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①

颜之推是侯景之乱期间流寓北朝的江左文人，卢思道则出身山东士族，二人曾经同为北齐文林馆成员。在第一段引文中，王籍的诗歌传入北朝引起卢询祖和魏收的讨论；第二段引文中，颜之推虽然没有提到各地诗人对于萧悫诗的具体评价，但能就一首诗而各自发表不同见解，本身就是文学交流的表现。《颜氏家训·文章》中还提到，当时著名文人邢邵与魏收身边各自聚集有一批文人，常常因为文学观点的不同而相互攻讦，所谓“邺下纷纭，各有朋党”^②。不论攻讦双方出于何种目的，单就这一行为本身来看，彼此攻讦正说明其时的文学活动颇为热闹。然而，到了隋代，文人交往的情况就比较罕见。从现存史料中，很少能够看到隋代文人之间纯粹文艺性质的集会、交往或文学交流，北齐时代南北文人“或谈经说史，或吟咏诗赋，更相嘲戏，欣笑满堂”^③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是难得一见的，更遑论如唐代太宗、武后时代宫廷宴会上文人之间的诗文竞胜。^④这种情况在隋炀帝即位之后有所改观，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与隋文帝不悦诗书的态度相比，其继任者炀帝（杨广）对文艺却是情有独钟。杨广出生的时代正是关陇文学稍有起色的时候，杨广在幼年时期便显示出对文学的热情，学习过风靡一时

①（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②《颜氏家训·文章》。

③（唐）李百药：《北齐书·许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④隋代诗人相互唱和的情况并非没有，杨素、薛道衡、虞世基同作《出塞》；许善心的《伤牛弘诗》（今不传）刘斌也有和作。但这样的例子毕竟不多。隋炀帝与江左文人之间也有诗酒流连的交往，但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弱势的一方很容易无条件地服从于强势的另一方。失去了公正和客观，文学交流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其局限性不言自明。因此，隋代诗人交往对于诗歌的促进作用其实十分有限。

的“庾信体”，这种热情一直保持到其成年以后。早在即位之前，杨广的身边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文人团体，史称“王府学士”。“王府学士”全部来自于南朝治下的江左地区，之所以能够聚集在杨广周围完全是因为他们自身所具备的深厚的文学素养，从这一点来看，“王府学士”对杨广的文学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杨广对文艺的兴趣以及较高的文化素质使他的眼界明显高于隋文帝，这一变化的文学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杨广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活跃了当时的文学氛围；其次，杨广即位后修正了文帝打击和抑制山东、江左力量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江左、山东士人遭受压制的心理压力。遗憾的是，杨广的文艺观并未能超越时代的限制，虽然他本人的创作水平已经达到突破南朝诗歌局限的程度，但他的帝王身份以及褊狭的审美好尚仍然对其时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杨广对南方文风的热衷限制了江左诗人文学创作的主动性，使后者错过了全面接触北方文学的机会，江左诗人入关后的平庸表现也是他们对杨广文学趣味妥协的必然结果。其次，作为一国之君的杨广，其审美取向不仅影响着江左文人，也必然波及整个文坛，隋代后期诗坛之不振与炀帝颓靡的创作取向有一定关系。

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进程看，隋代文学自发生之时起就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点。南北分裂时期，南北双方文学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南方作家在艺术表现、艺术技巧以及审美取向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并且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学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北朝统治阶级对文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以实用为主的浅薄层面，除了北齐后主统治那一段时期，北朝文学基本上未能摆脱作为政治学、伦理学附庸的身份。隋代作为南北分裂局面的终结者，不仅面临着政治、经济、地理各方面的统一大任，也要解决文化、文

学领域的纷乱局面，隋诗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需要“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阶段。这个背景决定了隋诗的面貌必然呈现出过渡型的特征。

隋代诗歌发生的环境尽管有诸多限制，但统一带来的积极意义同样毋庸置疑。政治和地理的统一无疑使得南北双方人员的交流更加密切，所谓“辞人才士，总萃京师”^①，南北文化无论是传播途径还是交流渠道较之以往都要畅通得多。文帝、炀帝对于江左、山东文化不同程度的借鉴、吸收，在客观上让南北文化的融合上升到上层建筑的高度，从而起到加速文化融合的作用。尤需指出的是，在牛弘、杨广诸人的努力下，隋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既为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提供了载体，也为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隋代的文化环境较之西魏、北周也大为改善：文帝即位后大力发展儒学，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伦理规范，统一了社会思想；炀帝即位后继续倡导儒学，进一步加强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隋代两代君主的努力下，隋代社会的文化氛围渐趋浓厚，诗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有利条件。南方诗人聚集京师，生活环境的改变或多或少地会对创作发生影响；北方诗人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南方文化、南方文人和南方文学，对他们的观念以及文学创作都有一定影响。有隋一代的诗歌创作与南北朝后期相比，虽然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某些细节方面已经体现出一些新意，比如在音律的运用、新型审美意境的创造、南北美学风格的融合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未来的诗歌发展确定了方向。遗憾的是，受外部环境限制，再加上国祚短暂，隋代诗人无法也来不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更多的实践。在这一背景下，隋代诗歌的整体成就自然有限，无论是作家还

^①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是作品都达不到一定规模。就个体作家而言，隋代统一对于文学的影响甚至比不上侯景之乱对文学的影响，隋代并没有产生一个可以超越庾信的大诗人。对于隋代诗人和诗歌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 隋代诗风的融合

南北诗风的融合早在隋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只是推进速度非常缓慢。自北魏孝文帝时代起，随着汉化进程的加速，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受到贵族阶层的重视。同时，“当时南方政权更迭动荡，一些文人由南入北，影响所及，更促使北方士大夫视文学为社会地位的标志”^①。北人文人（包括部分爱好文艺的贵族^②）开始有意无意地将南方作家与南方文学作为学习和模拟的对象。在文学氛围相对浓厚的社会环境中，北方地区文学有了一定程度提高，到北魏中后期出现了少数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作家（如萧综、温子升），但文学水平整体落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北人对于南北文风的差异缺乏理性的认识，纯粹的模仿显然难以取得积极成果，文风的融合自然也不能有效展开。

对于南方作家而言，文学发展水平上的绝对优势导致他们对于北方文学多持轻视态度，几乎没有主动了解和借鉴北方文学的主观愿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侯景乱梁时为止。侯景乱梁对南方王朝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政治和军事方面，而是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就文学而言，这种影响的现实意义在于：大批南方作家流寓北朝，由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改

①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349页。

② 孝文帝本人就是文学爱好者，《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

变，由南入北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文风变革，同时对当地的文学发展也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以庾信为例，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其一），正反映了庾信入关后由早年“庾信体”的轻艳绮丽向“健笔”风格的转化。仅就个人成就而言，庾信无疑代表了当时文学家的最高水平。但是就对文学的影响而言，流寓北齐的南朝作家似乎更值得关注。庾信入关后身处文艺水平低下、文学风气淡薄的西魏，其文学影响仅限于少数贵族子弟，对文学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很有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流寓北齐的作家，在相对理想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东魏和北齐占据的是原来北魏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方的文人大抵聚居在这一带。侯景之乱后，一些南朝文人也逃到北齐境内，更促进了北齐文学的繁荣。”^①与西魏统治者鄙薄文艺的态度相反，北齐后主“颇好讽咏”，且不排除江南文化与江南文人，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文学氛围，对于促进南北文风的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北齐文林馆的成立标志着北齐文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②其成员几乎涵盖了当时北齐所有的著名文人，其中包括后来入隋的卢思道和薛道衡。与前一阶段学习南方文人和文学的北方诗人不同的是，北齐诗人在学习南朝诗风的同时基本上仍能保持北朝诗歌固有的精神特质，他们虽然未能在“合其两长”的同时做到“各去所短”，但相对于纯以模

①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356页。

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文学，乃至整个北朝文学的大事……虽然这个文学机构是在来自南方士人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但机构本身的设立已经表明，北朝文学正在迎头赶上南朝文学。”引自周建江《北朝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17页。

仿为能事的魏收、邢邵而言，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看待南北诗歌的态度已经较为理性，这也是南北诗歌融合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

不管是庾信、王褒的个人化行为，还是颜之推等流寓北齐作家的群体性行为，总而言之，在隋代统一之前南北文风的融合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展开了。前人实践积累的经验，对于隋代文风的融合无疑是一个有利条件。隋代政治、地理、经济的统一则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文化交流和文人之间的联系在客观上更为普遍和经常。从理论上讲，隋代文风的融合比前一阶段具备更为充分的条件，但实际的情况是，上述条件并未成功转化为现实力量，隋代的文风融合并未达到理论上期待的水平，甚至也没有超越北齐。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宫体诗的影响时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被留后的庾信的《乌夜啼》、《春别诗》等篇，比从前在老家作的同类作品，气色强多了。移植后的第二三代本应不成问题。谁知那些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又屈服了。除了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三两首诗外，他们没有表现过一点抵抗力。”^① 这里提到的其实还是北方文人对南朝诗风的过度热衷，导致诗风融合难以健康合理地继续下去。隋代有“抵抗力”的作品其实不止上述几首，杨素的作品就颇有风骨。但就隋代诗歌整体情况而言，闻氏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隋代诗风融合缓慢的原因其实颇为复杂，除了闻氏提到的这一点外，尚有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文帝时期实行关陇本位主义政策，江左文人和山东文人受到打击和排挤，三地文人心理上的彼此排斥并未解除，从而限制了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此外，文帝视文

^①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唐诗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2页。